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基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视角^{*}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课题组

内容提要：历经近百年探索，我国逐步构建起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这一制度在顶层设计上有力回应了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面临的政治家干预、利益集团游说、通胀性税收扩张工具、内部人控制等挑战。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定位在于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创新设计总量型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构建最后贷款人、宏观审慎管理与存款保险三位一体的金融安全网，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实施政策协调、预期管理与跨周期调节，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国家金融安全的有机统一。新征程上，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持续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强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协同性，增强中央银行与其他部门政策取向一致性，稳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金融治理，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金融安全

作者简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课题组，102488。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6)04-0005-19

DOI:10.19795/j.cnki.cn11-1166/f.20260403.005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金融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研究”(24&ZD091)。本文执笔人：苗文龙(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曾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张藜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张藜元电子邮箱：convivial517@126.com。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完善中央银行制度。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重要手段。^①同时,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也是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有力支撑。作为金融强国的核心要素,强大的中央银行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将我国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载体。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的重要环节,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对于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核心要义,需要围绕一系列依次递进的关键问题展开系统分析:国际上经济发达国家的代表性中央银行制度面临哪些挑战?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的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具有哪些本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如何超越国际上中央银行制度的局限,并有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又应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安排,以促进经济增长并有效应对全球不确定性?显然,系统分析这些问题,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

基于此,本文按照“西方中央银行制度挑战—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演进—运行机理阐释—制度完善路径”的逻辑主线展开。首先,概括分析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其次,提炼分析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演进逻辑、阶段性特点和共同特征。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定位、制度功能、运行方式三个维度,重点阐述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运行机制。最后,结合日渐加剧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基于现代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强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协同性、强化跨部门政策取向一致性、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地位、增强国际金融治理的参与及引领能力五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政策建议。

二、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央银行是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产物,其早期主体多由大型商业银行演变而来,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9页。

建立初衷主要是为财政提供融资、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以及效仿发达国家经验等(凯文,2004)。随着商业银行声誉和竞争实力的不断增强,其职能逐步由单一的金融中介拓展为承担法定货币发行、管理存款准备、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并调节信用货币创造等公共职能,最终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何德旭、苗文龙,2022)。在此基础上,现代中央银行制度逐步形成,其本质是围绕实现币值稳定、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目标,系统构建并实施的货币政策、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机制以及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机制的总和(易纲,2020)。

从制度设计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在法律上被赋予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兼顾通货膨胀、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等多元目标。然而,在以政党竞争和选举政治为特征的西方制度框架内,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尽管在形式上强调独立性,其在实际调控经济运行过程中却面临一系列政治挑战。

第一,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在多党派竞选政治条件下可能被党派或政治家干预,服务于当选目标,从而诱发剧烈的政治金融周期。由于选民在决策时往往对近期经济表现赋予更高权重,当政治家能够影响中央银行政策时,往往在选举前推动实施低通货膨胀、低失业、低税收等不具可持续性的短期繁荣政策(Nordhaus,1975),在选举结束后转向正常甚至紧缩的政策取向。这种围绕选举周期的政治行为,加剧了利率、通胀率及失业率等宏观变量的不稳定性(Keil,1988;凯文,2004),形成具有显著负面冲击效应的政治金融周期。

第二,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可能成为利益集团攫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加剧发展和安全的张力。在现实中,代表强大资本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往往能够通过政治游说或政治压力,影响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关键政策机构,推动有利于集团利益扩张的政策取向,并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引致更高的持续性通货膨胀。由于不同利益集团及其政治代理人的行为普遍具有短期化倾向,倾向于将未来长期利益较多贴现到当前(凯文,2004),无论哪一方利益集团主导中央银行政策,均可能实施偏离社会长远利益的政策,使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难以在社会经济长期稳定与金融资本短期波动之间实现有效平衡。

第三,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可能被政治家用于隐性增税,造成通货膨胀并加剧多元目标冲突。当中央银行受到资本利益集团或其政治代理人影响时,货币政策可能异化为融资和利益不公平分配的工具,主要渠道包括:中央银行发行高于经济运行所必需的高能货币,从社会经济部门广泛攫取实际资源;通过较高的通货膨胀,使纳税者名义收入上升并进入累进所得税制中更高税率的纳税等级;对于持有大量债券或类似债券性质存款的经济主体,通货膨胀会导致债券实际价值缩水,其贬值部分成为政治家的隐性税收(凯文,2004)。此时,中央银行即便在名义上设定多元政策目标,实际上可能连最基本的币值稳定都难以实现,更难以维护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第四,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可能因内部人控制,造成政策透明度较低、动态

不一致等问题。尽管发达经济体试图通过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来完善制度安排,但上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缓解。一方面,西方国家中央银行逐渐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中央银行官员和政治家可能形成合谋,进而误导公众,加剧经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中央银行作为独立核算的主体,亦具有自身利益最大化和薪酬提升的激励,可能出现类似于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导致政策透明度较低(Friedman, 1982)、动态不一致问题(Kydland 和 Prescott, 1977)。内部人控制及其衍生的问题可能加剧中央银行政策对其最优目标的偏离。

三、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演进

(一)复合中央银行模式与“大一统”国家金融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始于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直至1979年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并恢复独立经营。这一时期,中央银行集货币发行、金融政策制定与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于一体,具有复合型银行特征。

基于解放战争后期的发展形势以及建党以来金融管理经验,1948年11月,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于1948年12月1日起发行人民币,^①执行和完善基于政府信用的、统一发行的主权货币制度。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为政务院直属单位,在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下,承担发行国家货币、管理国家金融、支持经济恢复和国家重建的任务,履行国家银行职能(西南财经大学编写组,2025),此外还履行经理国库、稳定金融、稳定物价、制定金融政策等政府银行的职能,开展信用贷款、零息贷款等政策性银行业务,经营储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货币兑换、支付结算等商业银行业务。

在计划经济时期,基于我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同时为有所侧重地推进重工业发展战略、降低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本,国家通过改造私人银行与钱庄、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并推动中国人民银行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机构进行整合,使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国家金融产权的唯一代表,兼具货币发行和具体金融业务办理职能(张杰,2011),进而建立起以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和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为主要构成的中国金融体系。中国人民银行作为货币发行管理机构和国家金融管理机关,具有国家机关和国家银行双重性质。

在这一阶段的不同时期,尽管中央银行的设立形式有所变动,但其基本模式均为“大一统”的复合中央银行模式,均由政府主导,中央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复合,是总分式组织的“大一统”银行。其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具体银行业务的经济实体,各项经营规则和制度均是为了保证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

^①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

任务的执行和实现(黄达、张杰,2024)。①

(二)从宏微观监管一体化模式逐步过渡到侧重宏观经济金融调控的中央银行制度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始于1979年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直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依法履行中央银行职责、发挥中央银行功能、侧重于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稳定,逐步实现法制化和规范化运行。

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自1979年3月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起,我国开启了从政府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配置资源转型的金融分权改革。此阶段金融制度的分权特征主要表现在: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四大国有银行相继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并大力发展分支行(何德旭、苗文龙,2021)。1983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张艳花,2018)。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中国人民银行法》)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制度正式进入依法设立和规范运行阶段。此时,中央银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宏微观监管一体化模式特征。2003年12月,《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决定》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此时,中国人民银行虽然还履行一些微观监管职责,但多具有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保障金融基础设施安全和推进宏观审慎管理的取向。②

随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2年10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1998年11月)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3年4月)相继成立,我国逐渐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国人民银行更为侧重地履行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稳定等职能,从制度安排上筑牢了强大中央银行的核心根基,为做好

① “大一统”金融体制与高度集中的财政信贷管理体制相一致。高度集中的财政信贷管理要点包括:国有企业资金的财政信贷分口管理;取消商业信用,集中信用于国家银行;规定企业只能从国家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取得信贷;取消多种结算方式及其流通工具,实行服务于指令性计划的几种固定结算方式;实行严格的现金管理;信贷资金实行自上而下的严格计划管理,相应地银行内部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贷的资金管理制度等。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的变革均未在实质上改变“大一统”的单一格局(黄达、张杰,2024)。

② 其他职责包括: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监督管理银行间外汇市场、黄金市场,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经理国库,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其中人民币发行及流通、银行间市场、支付结算、征信、经理国库、反洗钱等方面的监管,主要防控金融机构违规行为对金融设施和金融环境的影响,其法律法规制定的目的主要是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

货币政策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及时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不仅履行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职能,而且在宏观审慎管理、最后贷款人制度设计和实施、存款保险征收及风险处置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安排,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日益清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持续完善货币政策体系、探索宏观审慎管理、创建存款保险制度,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方向进一步明确。2013年,为落实监管主体责任、避免监管竞争和套利,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相关部门之间在金融统计、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协调和金融信息共享。2015年,我国颁布实施《存款保险条例》,中国人民银行于同年5月开始履行存款保险管理职能并收缴保费,2017年全面推行风险差别费率的存款保险制度,2020年起实施存款保险风险处置措施,通过购买金融机构股份、提供专项借款、金融稳定再贷款等风险化解工具,有效控制银行破产传染风险。2017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负责统筹协调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等重大事项,其办公室设于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至此,涵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及风险处置等职能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围绕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目标,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持续发展和完善。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层面明确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地位和意义。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市场与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及关系方面明确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规则及要求。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明确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清晰界定了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任务及定位。2023年3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划入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并在原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上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通过持续改革,我国逐步构建起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由中央金融委员会负责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现代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在此过程中,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发展,更加注重维护币值稳定、加强政策沟通与预期管理、运用市场化和价格型的间接调控方式、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

经过长期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实践和制度创新,我国逐步构建起既遵循经济金融客观运行规律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纪崮, 2024)。^①

四、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运行机理

围绕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和国家金融安全等核心内容,本文从制度定位、制度功能和运行方式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运行机理及其对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的超越。其基本运行原理如图1所示。

(一)制度定位: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区别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的根本所在。其一,党的领导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习近平,2026)。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能够确保金融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二,中国共产党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立场。“我们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归根到底要造福人民,与一些国家金融为资本服务、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本质截然不同”(习近平,2026)。这从根本上明确了我国中央银行政策设计和执行的价值导向。其三,党的领导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国中央银行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重大宏观经济政策由党中央讨论决定,国务院及主管部门就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向党中央报告,确保了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金融领域不折不扣贯彻落实。^②

^①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以货币政策体系和宏观审慎政策体系为核心,以服务实体经济的信贷政策体系为着力点,以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为载体,以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为根基,以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为防线,以中央银行财务预算管理机制为支撑,以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为平台,统筹处理好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稳增长与防风险、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

^②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88—1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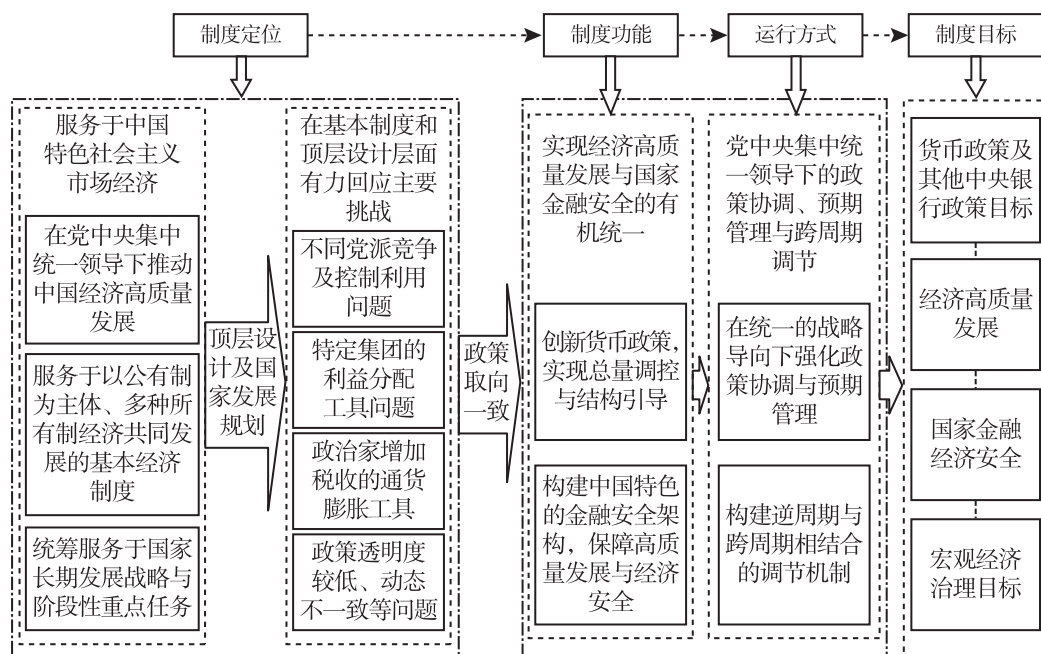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运行原理

2. 服务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经济社会制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地位,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①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为重点,形成了大型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体系和国有企业占产业主导地位的市场体系。在货币创造上,大型国有银行是货币创造和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求的主要渠道。在政策传导上,大型国有银行在传导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影响同业拆借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构建利率走廊的上下限等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大型国有银行在将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到公有制经济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同时注重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通过支持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发展,增强了银行信贷市场的适度竞争,提高了金融体系服务民营经济、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的能力。

3. 服务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与阶段性重点任务

制定并实施中长期发展规划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优势。通过设定长期战略目标、制定长期战略规划并实施长期战略举措,统筹协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监管政策等各方力量,推动经济稳定发展。在这一制度框架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9页。

下,我国中央银行制度有效兼顾了长期导向和阶段聚焦的统一。一是通过制定货币政策规则和设计总量型政策工具,推动产出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服务于经济长期增长目标;二是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乡村振兴、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等重点领域予以定向支持,更好地对接发展中的阶段性重点任务;三是通过宏观审慎资本管理、流动性管理、金融市场交易与金融基础设施管理等安排,调控宏观杠杆率与部门负债水平,增强对重大风险的识别、防控与处置能力,维护金融安全。

综合上述分析,我国中央银行制度从不同层面有力回应了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其中,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从根本上解决了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党派竞争引发的政治金融周期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解决了中央银行被特定利益集团工具化的问题;统筹长期战略与短期任务,缓解了政策动态不一致问题;以重大战略、五年规划等为核心的国家发展规划和顶层设计,加强了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了透明度和预期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内部人控制问题。

(二)制度功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国家金融安全的有机统一

《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核心职责。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以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为两项基础任务:一方面,通过货币政策调控总需求、优化资金价格与结构配置,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宏观金融条件与要素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宏观审慎管理、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等制度安排,形成对系统性风险的识别、约束与处置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与稳定预期。由此,推动实现发展与安全的有机统一。

1.创新货币政策,实现总量调控与结构引导

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在构建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基础上,形成了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包括以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策目标体系,以利率走廊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为支撑的传导机制,以及包括结构性货币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创新政策工具组合。从功能机理看,货币政策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展开:其一,通过数量型与价格型调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资金价格总体适度,稳定总需求与宏观预期,实现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其二,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优化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

(1)通过调控数量和价格,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与利率适度,推动“量的合理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根据国内宏观经济和物价的客观形势调节政策力度,利率较为适度和平稳,在收紧和放松两个方向都较为审慎、预留政策空间,与美联储等发达国家的“大起大落”存在明显不同(易纲,2023)。面对外部冲击,中国人民银行坚持以我为主、稳中求进,体现出较强的政策自主性和战略定力。例如,面对美国自2015年开启的加息周期,中国人民银行仅在2018年初小幅上调7天逆回购利率5个基点后即保持稳定,并通过降准等措施引导市场利率适

度下行。2022年以来,在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内经济恢复实际需要,及时适度调低7天逆回购利率30个基点,引导1年期LPR和5年期LPR分别下降25个基点和45个基点,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

上述稳健、渐进的调控取向,建立在制度化、市场化货币政策框架基础之上。围绕价格型调控转型,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构建了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推动货币政策由数量为主型向价格为主型转变,2013年初创设的常备借贷便利(SLF)构成利率走廊上限(何德旭等,2022)、2014年创设的中期借贷便利(MLF)逐步发挥中期政策利率功能。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具有一定特色的包含本币操作和外汇操作的公开市场操作体系。^①灵活运用正回购、逆回购、现券交易、发行央行票据等既有工具,并创设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等新型工具,有效调节市场短期资金供给,既在一定程度上熨平突发性和临时性因素导致的市场资金供求大幅波动,又在较大程度上稳定市场预期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苗文龙,2022)。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还在2019年进一步推进LPR改革,使之作为基准利率,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何德旭等,2022)。

(2)通过结构引导,精准滴灌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推动“质的有效提升”。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创新是在保持总量适度的同时,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嵌入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之中。当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时,高质量发展依赖于企业生产率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仅依靠总量扩张难以形成持续动能,必须通过结构性引导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强化长期增长基础。中国人民银行以政策性支持与市场化配置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再贷款、再贴现、专项工具及配套激励约束,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从而推动“质的有效提升”。

在具体实践中,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围绕国家战略重点形成差异化支持体系。一是科技金融方面,通过科技创新再贷款等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创新主体的信贷支持,并加强与科技、工信等多部门的协同,完善科技金融政策链条和风险分担机制,强化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金融支撑,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二是绿色金融方面,围绕“双碳”目标,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安排,在推动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低碳领域发展的同时,兼顾能源安全与经济平稳运行,实现绿色转型与发展安全的统筹协调。三是普惠金融领域,通过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等激励机制,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持续扩大对乡村振兴、民营小微、民生重点群体等领域的融资供给,推动经济包容性增长。四是养老金融领域,针对人口老龄化趋势,通过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工具,支持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推动养老产业规范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五是数字金融方面,以《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和《金融“五篇大文章”总体统计制度(试行)》等为抓手,加强数据能力建设和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推动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① 其中,外汇公开市场操作于1994年3月启动,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于1998年5月恢复交易。

2. 构建中国特色的金融安全架构,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与保障金融体系稳健

在国家金融安全制度体系建设中, 中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特色体现在最后贷款人、宏观审慎管理与存款保险三位一体的功能设计上。在中央金融委员会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下, 我国中央银行依托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的综合掌握, 履行最后贷款人、宏观审慎管理、存款保险三大职责, 有效降低重复监管成本和监管协调成本, 提高系统性风险防控效率。

第一, 中央银行在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的过程中, 逐渐具备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优势, 我国中央银行则根据系统性风险监测创新设计了最后贷款措施。最后贷款人制度的最终目标是为银行体系提供最后的流动性支持、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在操作层面, 当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困难且在市场上无法获得流动性支持时, 中央银行内部的金融稳定部门、宏观审慎管理部门、存款保险管理部门等相关政策部门, 能够及时充分掌握相关系统性风险信息, 并对其做出全面风险评估和判断。若该银行破产会危及银行与货币体系的整体稳定, 则须及时提供流动性支持; 反之, 若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则需进一步基于银行自身状况进行评估, 包括是否为暂时性流动性困难、后期是否具备偿付能力、是否拥有足够的可接受质量的抵押品, 评估条件均满足时提供流动性支持(孙天琦等, 2024)。此外, 我国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 着力从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 选择一批能够承担大额债券交易的商业银行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交易对象, 并且先后建立了一级交易商考评调整机制、信息报告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 从传导货币政策、发挥市场稳定器作用、市场活跃度及影响力、依法合规稳健经营、流动性管理能力、操作实务、配合操作室有关工作七个方面考评交易商的效果。^①二是创新设计SLO、SLF、MLF等借贷便利, 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必要补充, 在银行体系出现流动性困难时相机使用。

第二, 中央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优势使其具备有效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责的能力, 我国中央银行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有效组合, 建立“双支柱”稳定政策框架。中国人民银行于2016年基于前期实施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等机制, 进一步升级创新, 创设包含资本、流动性、资产质量等七个方面十余项指标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并结合影子银行风险演化和气候转型风险及极端天气冲击, 及时将绿色金融等专项内容纳入评估框架, 将同业存单纳入同业负债占比考核, 将表外理财、同业业务、跨境融资等纳入监测口径等, 增强逆周期调节与结构引导功能(曾敏等, 2025)。中国人民银行于2021年12月颁布的《宏观审慎政策指引(试

^① 2025年新修订的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考评指标包括货币市场传导、债券市场做市、研究和创新业务、合规稳健经营四个方面。其中, 货币市场传导包括稳定融出、合理定价的交易范围和资金紧张时期稳市表现两个方面; 债券市场做市包括做市成交、合理报价的债券数量和债市波动时期稳市表现两个方面; 研究和创新业务包括提供市场信息情况和参与创新工具情况两个方面; 合规稳健经营包括是否出现违法违规交易、操作事故、流动性安全问题等内容。

行)》不仅建立了“政策目标、风险评估、工具体系、传导机制、治理架构”的一体化框架,而且进一步明确宏观审慎管理牵头部门组织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宏观审慎工作协调机制。宏观审慎政策执行中如遇重大问题,提交中央金融委员会研究决定。跨部门协调议定的事项则通过会议纪要、备忘录等形式予以明确,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健全“双支柱”稳定政策调控框架,增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取向一致性和调控协同性,积极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①二是积极发挥宏观审慎管理关注金融体系整体稳定性和微观审慎监管强化个体机构稳健性的优势,加强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取向一致性和调控协同性,共同维护金融高质量发展。^②三是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与国家发展规划、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等的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第三,中央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优势,以及最后贷款人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使其在执行存款保险制度时能够提高银行破产风险控制效率。与美国等一些发达经济体将存款保险制度交由独立机构管理不同,我国由中央银行负责制定并推动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经过20多年的准备,结合国际存款保险制度的改进,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颁布实施《存款保险条例》,引入了风险差别费率和风险最小化模式(潘功胜,2015;郭晔、赵静,2017)。在具体操作上,各银行的存款保险费率首先确定为基准费率,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落实“基准费率+风险差别费率”的存款保险制度,^③并根据投保机构的存款规模、资本充足水平、资产质量、流动性状况、风险管理水平、公司治理状况,同时结合评级等因素确定各银行的风险差别费率,以充分反映投保机构的真实风险状况、发挥差别费率的风险约束作用。此外,在具体执行中,我国中央银行创新采取了破产银行风险处置、购买不良资产、认购银行股份、收购金融机构股权、专项借款、金融稳定再贷款等措施,提高对银行破产风险防范的前瞻性。

^① 宏观审慎政策可通过约束金融机构加杠杆以及货币、期限错配等行为,抑制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通过限制金融机构间关联程度和金融业务的复杂程度,抑制风险传染,促进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稳健运行,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和传导,增强货币政策执行效果。货币政策环境及其变化也对金融稳定构成重要影响,是制定宏观审慎政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实践中,二者协调配合加强的内容包括:加强经济形势分析、金融风险监测等方面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在宏观审慎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货币政策取向,充分征求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意见,评估政策出台可能的溢出效应和叠加效应,把握政策出台的次序和节奏;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同货币政策制定部门定期评估政策执行效果,适时校准和调整宏观审慎政策。

^② 宏观审慎政策从宏观视角出发,可对金融机构的一致性预期及其行为开展逆周期调节,提高对金融体系关键节点以及可能引发风险跨市场传染的金融产品、金融活动的管理要求,从而与微观审慎监管形成互补。微观监管部门较为全面的监管数据有助于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的准确性,有效的微观审慎监管措施有助于提高宏观审慎政策执行效果。在实践中,二者协调配合加强的内容包括:加强金融风险监测方面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在宏观审慎政策制定过程中综合考虑微观审慎监管环境,充分征求微观监管部门意见,评估政策出台可能的溢出效应和叠加效应,在涉及微观监管部门所辖领域时,会同微观监管部门共同制定宏观审慎管理要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同微观监管部门定期评估政策执行效果,适时校准和调整宏观审慎政策。

^③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区域金融稳定报告(2017)》,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

综上所述,最后贷款人、宏观审慎管理与存款保险三位一体的金融安全制度,是我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鲜明特色之一。

(三)运行方式: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政策协调、预期管理与跨周期调节

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有效运行,体现为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形成战略导向明确、部门协同顺畅、周期调节有序的政策运行机制。

在统一的战略导向下强化政策协调与预期管理。在党中央对经济金融工作的总体部署下,中央银行内部及其与其他政策主体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沟通与协同机制。一方面,中央银行内部不同部门沟通一致性及协同性得到强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部门、宏观审慎管理部门、金融市场监管部门、金融稳定部门、国库管理部门、支付结算管理部门、反洗钱部门等,在制定和落实不同领域的相关政策时,通过年度工作会议、联合执法监管、内部信息通报等方式,加强政策倾向、政策类型、协调工具、协同方式等方面的沟通。一致的央行内部沟通可以进一步疏通相关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缩短政策时滞(王博、高青青,2020)、提升政策透明度、加强市场预期管理,增强货币政策及金融安全政策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与其他部门等政策主体之间的沟通一致性及协同性得到提升。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不仅在顶层设计层面强化了中央银行与企业、居民、金融机构等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政策沟通,提高了政策的透明度,加强了市场预期管理,而且强化了中央银行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其他国家政策部门之间的政策倾向、政策类型、政策前瞻性及部门协作方式的沟通。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制度化沟通机制,增强宏观政策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从而稳定市场预期,提高宏观调控效能。

构建逆周期与跨周期相结合的调节机制。党中央对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周期趋势的科学研判,为中央银行实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提供了战略指导。首先,党中央对发展阶段与结构特征的总体判断,为中央银行识别经济所处周期位置及其演进趋势提供了战略参照,使政策在节奏、力度与衔接上保持一致,避免短期应对偏离长期目标,从而提升周期调节的精准性与协调性。其次,中央银行在把握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次要趋势、短期波动的状态及阶段的基础上,将科技自立自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和改革创新等战略方向嵌入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框架,实现短期稳定与长期转型的统一。通过将战略导向融入年度政策安排,增强政策的连续性与前瞻性(樊明太,2022;刘元春、丁洋,2023)。同时,中央银行充分利用逆周期调节经验,进行前瞻性、稳定性、连续性的逆周期调节,将逆周期需求政策和跨周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既通过利率与流动性工具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又防止过度刺激积累中长期风险;既稳定总需求,又引导资源向高质量发展方向配置,增强了中央银行的政策效能。

五、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中国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一)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遵循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央银行必须通过有效引导和调控金融体系,推动其更好地服务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必须有金融的支持,也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服务于这一宏伟目标,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有着明确的根本遵循与行动逻辑,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在金融领域的深化和具体化,是党在金融工作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这既是根植于国情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也是应对金融工作复杂局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现实需求,更是金融进入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未来需要(何德旭,2022)。坚持党中央对中央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金融治理效能、避免西方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协调不足的重要制度优势,为做好宏观经济调控、最后贷款人职责、宏观审慎管理、存款保险工作、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现代中央银行工作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党的领导体现在做好金融监管与调控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在重大问题研判、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风险应对、中央和地方金融工作协同等方面发挥“总指挥”作用(何德旭,2024)。在党的领导下,中央银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并就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及宏观审慎管理情况向党中央报告。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金融工作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增强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习近平,2026)。在这一根本价值取向的引领下,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在新时代的体现在于充分遵循现代金融的定价规律、周期规律、供求规律、资金流动规律等基本规律,进一步通过依法高效履职,更好地管理和服务金融体系,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经济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金融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强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协同性与精准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①进一步强化货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18页。

币政策调控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协同性是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内容。

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金融基础服务等职能有机融合于统一分析框架,进一步准确量化和强化中央银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审慎监管可实现的政策目标。一方面,将币值稳定、金融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政策目标纳入统一目标函数,在此基础上求解各政策目标间的最优均衡,实现各经济指标的最优值和人民福利最大化。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升级、金融结构波动等数据,结合网络大数据信息以及金融市场/金融部门联系等典型事实,进一步准确计算自然利率、空间维度及时间维度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阈值等基准变量,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政策操作的锚(何德旭、苗文龙,2022)。

从总量影响、结构调整、个体监管等层面,厘清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传导关系,强化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统一性和精准性。围绕现代中央银行政策的最终目标,有效整合货币政策工具、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国际收支平衡调控工具,相机实施总量型政策工具、结构性政策工具、个体性政策工具,疏通操作工具与最终目标之间的传导机制,既积极调控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币值稳定,又深化对特定行业的经营特征、资产规模及结构具有重要影响的直接信用控制、间接信用指导、行业性宏观审慎政策等工具的精准操作,以及探索对特定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产生影响的调控工具。

(三)强化中央银行政策与其他部门经济政策之间的取向一致性和相互配合度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实施效果评价”。^①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是在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下,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同时发挥好产业、就业、区域、监管等政策作用,从总量、结构和水平上服务经济增长、风险防控等一系列重要国家战略。因此,需要在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下,进一步提升中央银行政策与其他部门经济政策之间的取向一致性和相互协同度,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一,提升中央银行政策与其他各经济政策的多层次取向一致性。政策取向一致性体现在政策工具执行层次相辅相成、政策调控类型层次协调协同、各种战略规划发展相长等三个不同层次。由于各经济政策特点、经济现实和组合安排的因素影响,政策取向一致性难以确保在每一个层次都完全一致、节奏相同,此时低层次的一致性服从和服务于高层次的一致性,所有政策工具、政策类型、政策调控均统一于国家总体部署。因此,中央银行政策可在多个层面上提升与其他经济政策取向一致性,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结构优化、企业经营绩效优化、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等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细分目标及总目标等不同层次目标的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17页。

达成度。

第二,提高中央银行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组合函数估计的精准性。一是提高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组合函数估计的精准性。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实施好货币政策,维护金融市场整体稳定,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证监会要协同形成全覆盖、无死角的金融监管格局。^①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金融安全网上肩负责任最多的政策部门之一,需要进一步兼顾各地政府部门、企业部门、银行部门的经济行为和博弈策略,提高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等政策函数之间数量关系估计的准确性。二是根据货币政策函数、审慎监管函数、财政政策函数、产业政策函数等,中央银行进一步系统改进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金融结构方程和经济政策组合结构函数,准确估测地方政府部门、金融部门、企业部门的行为,提高经济政策协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第三,提高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函数与其他大国经济政策函数之间数量关系估计的精确程度。以本国经济政策组合函数为基础,进一步纳入经济大国及经济关系密切国家的货币政策函数、金融政策函数、财政政策函数等,准确监测国际上重大经济政策变化对全球经济结构及发展的影响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冲击,设计精确的国际共赢合作规则,提升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和全球经济治理能力。

(四)提升新发展格局中人民币国际化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外部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②在这个过程中,强大的主权货币尤为重要。拥有强大的货币,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外汇市场广泛使用,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是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要素之一(习近平,2026)。因此,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就必须不断提升新发展格局中主权货币的国际化地位。

第一,通过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保障人民币币值稳定。当前国际上的货币制度在本质上均为信用货币制度,币值的稳定程度实质上反映了一国政府对发行货币时承诺的实现程度,体现了国家的信用程度。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地位,就是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全球的国家信用。中央银行是一国货币发行的核心主体,一国强大的主权货币与强大的中央银行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强大的主权货币是本国中央银行成为全球央行的前提,本国中央银行的有效管理则成为强大货币的保证(张晓晶,2024)。我国中央银行需要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提升政策精准程度的基础上,有效管理货币币值稳定、提高人民币国际信用。

第二,稳步推进数字人民币发展。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我国作为最早尝试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之一,经过十多年的研发、应用试点和努力探索,初步建立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持续深化创新应用和场景建设,特别是在法定数字货币的原则确立、理论设计、技术架构、场景应用等方面已经积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31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66页。

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并在上海设立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在北京设立数字人民币运营管理中心。进一步扩大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和使用范围,提高数字人民币交易和投资便捷性,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多元化全球数字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与更广泛的信用良好的国家实施对等优惠关税,同时积极推动双边货币结算,提升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比例。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信用良好的国家积极磋商、降低贸易关税,互利互惠,助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积极推进双边货币结算,提高本国主权货币地位。例如,在我国进口贸易中,提高人民币结算比例;在我国出口贸易中,适度提高贸易伙伴国家主权货币的结算比例。通过这一措施,提高我国主权货币在全球各主要经济往来国家的地位和使用,增强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的多元化及其与我国贸易结构的匹配度,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国际独立性。此外,在积极提升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能力和跨境风险传染防控能力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开放。

(五)增强中央银行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参与及引领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加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着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①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改革,顺势而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②

第一,在金融领域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建立多边互利共赢的金融新秩序,推动主要多边金融机构深化治理改革,支持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更好发挥作用,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不断以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和平、共享、开放的世界经济。

第二,坚持金融全球化正确方向,加强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的服务。进一步推动新开发银行由金砖国家发起的多边开发银行向更具全球性的多边开发机构发展,进一步发挥亚投行的作用,以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平台,向亚洲各国家和地区提供更为高效的项目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在改善国际发展环境的同时,提升我国中央银行在全球金融新秩序中的引领作用。

第三,面向全球金融格局深刻调整和国际治理体系重塑的新形势,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稳定委员会(FSB)、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等重要国际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34—135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42—143页。

金融组织成员,应进一步提升中央银行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制度化能力和规则塑造能力。在宏观审慎监管、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等关键领域,加强政策协调与规则对接,增强在全球金融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持续完善制度供给与政策实践,总结并凝练兼顾稳定与发展的中国经验,逐步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度方案,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与包容的方向演进。

参考文献:

1. 郭晔、赵静:《存款保险制度、银行异质性与银行个体风险》,《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
2. 樊明太:《经济发展目标动态校准和宏观政策逆周期抉择——超预期冲击下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目标近期证据》,《宏观经济研究》2022年第7期。
3. 何德旭、苗文龙:《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宏观经济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4. 何德旭、苗文龙:《现代中央银行政策:理论、挑战与重构》,《经济纵横》2022年第1期。
5. 何德旭、王朝阳、闵逸杰:《中国金融发展十年主要成就及重要经验》,《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6. 何德旭:《加强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必然》,《财贸经济》2022年第9期。
7. 何德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金融评论》2024年第4期。
8. 黄达、张杰:《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9. 纪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接受〈中国金融〉采访》,《中国金融》2024年第11期。
10. [英]凯文·多德:《竞争与金融——金融与货币经济学新解》,丁新娅、桂华、胡宇娟等译,王志芳、周业安等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 刘元春、丁洋:《论就业管理模式的变革趋势:从逆周期到跨周期》,《管理世界》2023年第1期。
12. 苗文龙:《宏观视角的中央银行政策》,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13. 潘功胜:《新常态下的中国金融改革》,《金融论坛》2015年第6期。
14. 孙天琦、郭昊蕙、汤振强:《流动性风险与资不抵债风险的研判》,《中国金融》2024年第13期。
15. 王博、高青青:《中央银行沟通的一致性——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证据》,《财贸经济》2020年第7期。
16. 西南财经大学编写组:《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5年版。
17. 习近平:《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求是》2026年第3期。
18. 易纲:《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效性与经济金融稳定》,《经济研究》2023年第6期。
19. 易纲:《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人民日报》2020年12月24日。
20. 曾敏、李武、苗文龙:《宏观审慎政策:理论发展与中国特色实践创新》,《经济学家》2025年第11期。
21. 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2. 张晓晶:《金融强国的核心标识:强大的货币与央行》,《财贸经济》2024年第5期。
23. 张艳花:《中国金融改革坚定前行——访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中国金融》2018年第19期。
24. Friedman, M., Monetary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14, No. 2, 1982, pp.98-118.
25. Keil, M. W., Is the Political Business Really Dead? .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55, No.1, 1988, pp.86-99.
26. Kydland, F. E., & Prescott, E. C.,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5, No.6, 1977, pp.473-491.
27. Nordhaus, W. D.,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42, No.2, 1975, pp.169-190.

The Path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Perspective from the Modern Central Bank System

Research Group on Deepening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102488)

Summary: A modern central bank system is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a modernized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 core element of a robust financial system, an important part of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a significant driver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While the modern central bank system established by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is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political manipulation, susceptibility to influence from interest groups, misuse as a tool for fiscal expansion, and issues of insider control, th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follows the laws of financial operation but also serves China's actual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overcoming many of the problems faced by central banks in Western countries.

This study delineat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central bank system into four stages: the initial complex unified model, a period of integrated macro and micro regulation, a subsequent focus on 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entral bank system (MCBC)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evolution has culminated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hat synthesizes monetary policy,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the lender-of-last-resort function, and deposit insurance. This integrated structure has proven effective in mitigating the aforementioned problems faced by central banks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MCBC is positioned to serv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First, it has promote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regulated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stay and diverse forms of ownership developing together, and effectively balanced long-term national strategies with phased key tasks. Second, it has independently designed open market operation tools, such as the 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 (SLF), explored and implemented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ies such as special lending facilitie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green economy, inclusive loans, pension finance, and digital finance, and improved the last-resort lending mechanisms. The system ha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and a differential-rate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and promptly handled financial risk events. Third, it has designed operation mechanisms that are clearly strategic-oriented, effective inter-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and orderly cyclical adjustment, all under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three ways. First, it provides an exploratory summary of the main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entral bank. Second, it analyzes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central bank system, elaborating on the MCBC's positioning, functions, and policy toolkit. Third, it outlines a prospective development path for the MCBC.

Keywords: Modern Central Bank System,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ional Financial Security

JEL: E50, G00, H00

责任编辑:原 宏